

Doi: 10.20063/j.cnki.CN37-1452/C.2026.01.007

《列子》“海洋想象”历史成因论考

刘国钦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列子》“海洋想象”之叙述片段大约形成于战国中后期,并与以齐国为主体的先秦邻海国家发生事实上的关联,而这种联系则源于列子早期求学时与齐国神巫季咸的交流及其门人弟子“使于四方”的特殊经历。同时,齐国等先秦海洋文明在航海发展历程中所积累的近海航海经验和有限的海洋认识,亦在历史层面制约着《列子》书写海洋时的创作视野,而限制本身又引发了创作集体对远海的想象性探索,并结合列御寇及其门下弟子的有限的海洋认识而催生出《列子》跨越时空的“海洋想象”。在此基础上,《列子》创作集体在理论和创作方面主动接受燕齐滨海方士学说之影响,进而使《列子》“海洋想象”浸染了浓厚的方士文化色彩,展现出投身于虚幻世界以保持自然天性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列子;海洋想象;海洋文化;先秦诸子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6)01-0049-07

《列子》作为构成战国道家思想体系的经典著作,其传世版本的真伪问题历来为学界争议之焦点。自唐柳宗元作《辨列子》指出该论著存在“疑其杨子书”“言缪公后事”^{[1]287}等诸多疑点以来,历代学者或持“《列子》伪书论”,或执“《列子》非伪论”,双方据此展开的论争从未消歇。因《列子》成书年代久远,目前尚缺乏可靠出土文献能够确证其真伪,故两派观点虽各有佐证却难成定讞。今综观诸家之说,似马达“《列子》定本非列御寇一人之作,而是列御寇、列子弟子、列子学派著作的汇编”^{[2]463}的观点较符合实际情况,而学者张洪兴也认为,《列子》原为先秦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后世学者的重新编纂与创作^[3]。因此,《列子》就其本质而言应当是集体创作的历时性产物,不可遽指其为纯粹的后人伪托编造之书。

受制于上述文献真伪问题的争议,《列子》研究目前多集中于哲学思想、寓言故事、真伪考辨、语言文字、《列子》学术五个方面,而其深层次内容仍处于“待开发”状态,至于从海洋文化视角出发对《列子》文学要素进行研究的文章,则更为稀少甚至完全空白。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列子》

叙事文本中的“海洋想象”,并以海洋文明史为基本视域考证其客观历史层面的形成原因,以期为《列子》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必要的拓展和补充。

一、“海洋想象”及其历史区位

《列子》以叙事写人见长,其诸多篇目在文辞、笔法等方面与魏晋志人或志怪小说类似,而所谓的“海洋想象”,正是《列子》在此类叙写文本之中对于“海洋”这一意象展开的,具有浓厚的想象意味和虚幻色彩而并非客观实录的书写或描绘,其中颇具代表性者如《列子·汤问》所载:

革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蹇峙焉……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

收稿日期:2025-07-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书行政制度视域下的秦汉公牍文研究”(21AZW004)

作者简介:刘国钦(1998—),男,山东东营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称焉,其名为鯤。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1]151-157}

此处对于“大壑”等海洋形态的书写涉及江河注海、仙圣播迁、鲲鹏巨兽等内容,风格怪诞离奇,显然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海洋地理考证。即使参照《列子》中诸如“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1]44}“滨北海之北”^{[1]163}等其他关于海洋的描述,依然难以从中发现明确的地理指向,作者似乎更倾向于将海洋与神话寓言相勾连。然而,一般来说,人类主观意识的产物是不可能完全脱离客观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因此《列子》这种想象性书写亦应具有某种现实本源,体现为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水平而形成的虚幻性表述,而若要追溯这种现实本源及其“由历史到文本”的衍生轨迹,则首先应当辨明《列子》“海洋想象”所处的历史区位问题,即此类内容“形成于何时”与“确立于何地”的问题。

《列子》既为历代作者集体智慧之结晶,则其中各具体片段的形成时间或曰创作年代当各不相同,不可以“先秦至于魏晋”笼统概括。上引《汤问》篇“海洋想象”内容的作者虽已难于确考,但其文本中的叙述方式及相关细节,却与同样存在大量想象性描写的《山海经》存在高度相似之处,例如:

蓬莱山在海中。(《山海经·海内北经》)^{[4]146}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山海经·大荒东经》)^{[4]155}

《列子》和《山海经》两部作品在叙述方面均涉及“海中有仙山”这一共同话题,并赋予海洋以某种遥远而不可知的神异色彩,表现为想象性书写的特征,甚至“蓬莱”“大壑”等专有名词亦为双方所共用,据此显然很难否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如此尚不能明确《列子》及《山海经》相关记载何者在前的问题。据当代学者万群考证,《山海经》中《海经》《荒经》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末秦汉初,与《荀子》《韩非子》等战国后期子书接近^[5],而列御寇生卒年则在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375年的战国前中期^{[6]694},这意味着《列子》成书的时间跨度同时越过了《山海经》成书年限的左右两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列子》的“海洋想象”本出于“殷汤问于夏革”的相关记载,

而此记载考之先秦文献似仅见于《列子·汤问》及《庄子·逍遥游》(后者作“汤之问棘”,王先谦注曰“棘、革古同声通用”^{[7]3});与此同时,《汤问》中的“终北之北有溟海者”等内容亦在《逍遥游》中以“穷发之北有冥海者”的形式出现,两者文字内容大致相同。一般认为,《庄子》中如《逍遥游》等内篇部分出于庄周自著,而庄周生卒年则在列御寇之后的公元前365年至公元前290年^{[6]696},客观上存在转录《列子》相关记载的可能。同时,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亦持《庄子》称引列子之说^{[8]123}的基本观点,置列子于庄子之前,而清代王先谦甚至在注解《庄子》“汤之问棘”时直接征引《列子·汤问》之记载以为佐证^{[7]3},据此来看,“殷汤问于夏革”故事更早见于《列子》而非《庄子》当无疑义。如果以此为基础参考《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及其与《列子》在“海洋想象”方面的相似性特征,则可基本确定今见《列子》对海洋的想象性书写应产生于战国中后期,并极有可能是自先秦古本《列子》中继承而来的重要内容。

除此之外,《列子》其他篇目中涉及“海洋想象”的片段尚有7处,其内容总体上与“殷汤问于夏革”的故事类似,仍然将海洋作为遥远虚幻之物加以阐述,并与神话或寓言等夹杂在一起;如前引“列姑射在海河洲中”的说法即亦并见于《山海经·海内北经》^{[4]145}以及《庄子·逍遥游》(庄氏作“藐姑射之山”)^{[7]5}等,其形成时间及相关考证与“殷汤问于夏革”略同,兹不赘述。

以《列子》“海洋想象”片段的创作年代为基础,基本可以确定此类内容应出于列御寇及其早期弟子之手,但对于这一先秦创作集体与海洋在地理上的联系、接受海洋文化影响以形成想象性书写的途径尚不甚清晰。据有关考证,列子生前隐居郑国圃田近40年,以收徒讲学为业,后又因故前往卫国^[9],毕生行迹似皆集中于中原之地而与海洋无缘;唯《列子·仲尼》所载“子列子好游”^{[1]127}之事稍显可疑,似乎能够暗示其早年求学时曾经游历别地,其中极有可能包括部分滨海地区。今案学者陈成吒之说,列御寇早年所游之处实为宋国沛地^[10],即今江苏省徐州市一带,关于这一地区在先秦时期的地理状况,《尚书·禹贡》记载“海、岱及淮惟徐州”^{[11]142},汉孔安国传云“东至海,北至岱,南及淮”^{[11]142},整体上属于较为典型的滨海地区;至于列子当初游历时前往过的具体地点,因年代久远已无从考证,但是从徐州的地

理位置以及该地区所属的淮海文化的整体性或曰一体化特征^{[12]89-92}来看,列子在沛地求学访问之时,即使未曾亲身接触过海洋或其他形式的滨海自然景观,亦至少能够感受到此地海洋文化与中原内陆文化的差异性特征,并对“海洋”及相关概念形成了初步的印象。

由此观之,列子其人与海洋当存在着地理意义上的有限交集,但是宋国沛地就其基本性质而言仍为列御寇短暂游历的目的地,而非其原本生长或长期居住之地,因此《列子》的“海洋想象”片段应当需要继续通过某些间接途径,去获得被创作出来的现实“海洋”基础,而由此复审《列子》文本书写的具体情况,其“黄帝”篇载“季咸相壶丘子”之事的细节就颇值得注意:

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郑,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如神。郑人见之,皆避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而归以告壶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1]70-71}

神巫季咸来自齐地,而齐国在先秦时期为典型的“海洋国家”,战国以前即已实现渤海海面 and 环绕山东半岛的海上航行,其规模颇为可观^{[13]321};同时,齐国通过海盐资源的输出与中原各诸侯国建立起经济贸易联系,从中获取高额利润^{[13]225},并由此走上富强称霸的道路。及至战国时代,齐桓公(田午)于国都临淄置“稷下学宫”,聚集当时学者一千余人^{[14]500},齐国遂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主要阵地,后世所谓阴阳五行学说、“稷下道家”等皆兴起于此,并由此促成了齐、燕等地滨海方士文化的崛起^{[13]351-352}。可以说,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具备了海洋文明的多种特征,并能够向其他诸侯国输出海洋经济产品和其海洋文化。回归上述文本,通过“心醉”和怀疑壶丘子之“道”的行为反应来看,求学中的列子应当是与来自齐国的神巫季咸进行过深入交流,并为其学说或方士之术所折服,而这也间接体现出齐国海洋文化在向外输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季咸的巫术最终为壶丘子的道术所败,列子本人亦重新回归于“学道”^{[1]75-76},但是揆诸常理,方士季咸对于求学进道中的列子的影响不可能就此完全消失,否则列子作为诞生于内陆地区且在滨海地区游览经历较为有限的道家学徒,其著作中恐怕难以必然出现如前引“汤问”篇

中对于亿万里外之远海的奇幻想象,至于此种想象与滨海方士文化之间的具体关联,则留待后文再论。

二、航海发展局限催生“海洋想象”

《列子》“海洋想象”片段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客观事实,以及列御寇本人与海洋在地理层面上的所无法忽视的空间距离,使《列子》对海洋的想象性书写一般通过诸如接受齐地文化影响等间接途径来获得现实基础,因此包括齐国在内的滨一些海地区的航海发展状况,又同时限制着这种“海洋书写”所能达到的水平和高度。

根据上文已有之论述,齐国在渤海及山东半岛周边的航海活动已相当活跃,并通过海盐贸易取利于诸侯,但此二者在空间上显然局限于距离海岸线不远的近海区域,与《列子》中描述的“几亿万里”之外的远海尚不可同日而语。依据现有考古所得及地理学分析,齐人航海所能到达的最远地区不过今日本列岛及朝鲜半岛一带^{[15]24-28},置于当今全球视野之下难以定义为地理跨度较大的远洋航行,亦无法为《列子》对遥远海域的想象性书写提供直接的、征实可信的素材,因此,《列子》“海洋想象”的间接现实基础应当是齐人在相对近岸之海域的航海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于海洋的有限认识。试以此审视《列子》所载航海活动:

海上之人有好沔鸟者,每旦至海上,从沔鸟游,沔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明日之海上,沔鸟舞而不下也。^{[1]67-68}

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为不知己,去,居海上。^{[1]264}

尽管存在较多对于海洋的神异幻想,但是当涉及真实的“人”的问题时,以列御寇为代表的创作集体却转而将海洋视为适合人类生存、可以隐居避世甚至“每旦至”的理想之地,而这显然是齐人近海航海经验在《列子》创作中的折射,毕竟正常情况下,人类几乎不可能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海洋深处长期生存下去——当代学者在注解此处时多将“海上”解释为“海边”,可以说不无对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同时,如果深究上引《黄帝》篇所提及的海鸥这一鸟类,则可发现其所属鸽形目下的各科属之栖息环境通常不能脱离海岸、岛屿甚至内陆^{[16]27-43},客观上仍为近岸海域所能观察到的生物种类,而其能够作为描写对象呈现于

《列子》文本之中,亦应是列子从齐国近海航行经验中搜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发挥的结果。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先秦时期航海发展的历史局限性在制约《列子》创作视野的同时,亦为其想象性书写的展开提供了现实内驱力,正如原始先民创制神话及巫术以求解释自然现象那样,列御寇及其弟子亦尝试借助叙述话语超越其当下所能认识的海洋,而对更遥远的海域作出具有本学派特色的阐释,表现出人类所天然具有的好奇心理和探索精神。当然,这种探索和阐释本质上仍然以现有认识为根基,例如开篇所引“汤问”篇之记载即幻想亿万里外有深不可测的大海,天下江河水流以至于天上银河“莫不注之”,并有五座神山在海中“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翹峙焉”^{[1]152},将近海地区常见的江河入海、高山临海、潮汐起落等景象移植于想象中的遥远海域;而其所系附之“二山沉海,仙圣播迁”的神仙传说,则可视为自远古神话普遍创作动机中继承而来的“集体无意识”^{[17]36-37}行为,是《列子》相关创作中想象意识而非实录意识的自然流露。同时,由于列御寇等人获得海洋认识所具有的间接性质,其“海洋想象”有时亦会受限于中原地区的思维习惯或认知方式,对齐国人已经熟识、但中原人尚不甚了解的近岸海域展开想象叙述,例如: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心如渊泉,形如处女……阴阳常调,日月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厉,鬼无灵响焉。^{[1]44-45}

“海河洲”即为黄河入海之地的河洲,而依今《黄河志》所录,黄河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464年)第一次大改道之后由黄骅流入渤海,至战国亦然^{[18]18},因此能够在渤海海域大规模航行的齐人应相当了解黄河入海口的基本情况,不必依托神话幻想来弥补认识上的不足。与之相反的是,列御寇的海洋认知来自“道听途说”,海洋在其印象中更多呈现为某种虚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因此其想象性书写不仅涉及齐人所不能直接描述的远海,而且也在无形中吸纳了自己也许未曾亲眼见过的近海。由于眼界的局限性,作者在设想神山美好景象时侧重于四时规律、五谷丰登、无灾无病等方面,表现出朴素安分、敬天顺时的中原农耕文化的思维特征;而从认知的主观能动性

层面来说,此亦为作者想象意识的拓展和微观化运用,即其在运用“远海想象”超越齐人航海经验局限的同时,亦通过“近海想象”填补自身海洋认识的空白。如此一来,战国时期航海发展的历史局限即与《列子》创作集体的探索意识发生碰撞聚变,客观上反而催生了跨越时空的“海洋想象”。

此外需要予以辨明的是,《列子》之“海洋想象”所倚重的现实基础虽以齐国航海发展状况为主,却并不具有唯一性。综合列御寇近四十年的收徒讲学经历以及“海洋想象”片段的总体形成年代,与其同处战国时代的部分弟子或后学之人亦应参与了相关创作,尽管这些后学者的身份大多已难于确考,但是个别史料记载中仍可透露出其与海洋的潜在关联,如《战国策·韩策二》载:

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王曰:“正亦可为国乎?”曰:“可。”王曰:“楚国多盗,正可以圉盗乎?”曰:“可。”^{[19]312}

史疾其人于史无传,且亦无旁证可以确认其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但从《战国策》称其“治列子圉寇之言”,并创造性地提出列御寇“贵正”来看,列子学说在战国纵横家群体中应有其传授路径,且被作为游说诸国时可资征引的治国实践经验并加以运用,而这就意味着纵横家亦有较大可能参与了对《列子》的解读、审视甚至改写、创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纵横家在现实政治活动中并非“安分”的民间团体,他们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并深度介入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活动,而其中如张仪、苏秦等甚至长期为某些特定国家效力;在此过程中,作为列子后学的纵横家的政治参与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齐、楚、燕等邻海国家,并在无形中受到其海洋文化形态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以上引史疾所使之楚国为例,其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东海,具有深厚的海洋文化传统,而楚国大夫屈原所作《离骚》《天问》等亦为先秦海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3]384-398};若将屈诗部分片段与《列子》相比较,则其中的文化关联更为明晰,例如《离骚》中有“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20]25},不仅提及与《列子》所谓“季咸”之名大致相同的神巫,而且出现了前述“海洋想象”中常见的“神人居于山上”之意象,而《离骚》本身“升天入地”的浪漫主

义色彩亦在主观情志方面与列御寇对遥远海域的幻想不谋而合。据此可以推测,《列子》创作中的“海洋想象”虽以齐国航海经验为主,却并非局限于此一端,其应是基于先秦总体航海发展状况以及相关海洋认知而产生的一类文学现象。

三、“海洋想象”之方士文化色彩

依据前引《列子》诸叙述片段可以发现,其“海洋想象”不乏仙怪灵异、神话传说之要素,并与《山海经》等为神仙方士所重视运用甚至加工整理的作品^[21]¹¹⁹⁻¹²²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带有方士、巫覡等试图以荒诞之说解释不可知世界的意味,而关于此种方士文化,前辈学者卢云有详尽阐述,兹转录如下:

方士文化是在燕齐滨海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崛起于前四世纪下半叶的齐威王、宣王时代……究其尤端,主要有三大系统。一是脱胎于原始巫术的周地方术;二是在滨海地带故有的原始崇拜的基础上,结合外来神话与传说而形成的滨海神仙说;三是滨海地区兴盛的阴阳五行学、黄老学与儒学等学术文化。这三支文化源流在前四世纪的燕齐滨海地带交汇、融合,逐渐发展成滨海方士文化。^[22]⁹⁵

若依钱穆所考列御寇生卒年代,则列子本人与方士文化的崛起并无交集,但是从《列子》书中对“渤海”的反复提及和称引管仲、齐景公事迹来看,列御寇对齐地历史文化应早有了解,而这似乎又可以追溯到其早年求学时与齐国神巫季咸交流并服膺其方术的经历。在重视师法传承的诸子学术时代,列御寇作为本门宗师而对齐地文化、神仙巫术等方面有所关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弟子或后学之人的治学意趣及文化接受导向。况且,列御寇及其弟子主要以齐国航海经验,特别是其近岸海域经验为依据建构《列子》“海洋想象”,而对此类经验的借鉴本身又蕴涵着对齐人海洋认识或曰相关知识的吸纳,因此燕齐滨海地带的方士文化很容易在无意识状态下进入列子一门的学术体系。此外,滨海方士文化既以阴阳、黄老等诸子之术为重要源流,则其本身应当不难反作用于继承道家传统的列子学说,更何况作为战国诸子学术中心且孕育了“稷下道家”的稷下学宫亦设于齐国首都临淄,这是弟子后学“使于四方”而又以

齐地文化为重的列子学派所难以回避的。

事实上,方士文化作为先秦海洋文明的产物,其精神观念、认识方法等早已渗透于《列子》叙述体系甚至列子思想之中,并不仅仅因“海洋想象”而与之产生关联。首先,在叙事方面,《列子》偏好于言说难以确知的“方外某国”之事,既有黄帝所游“华胥氏之国”^[1]⁴¹、周穆王时“西极之国”^[1]⁹⁰、禹迷途所见“终北之国”^[1]¹⁶³等述之甚详者,又有“古莽之国”^[1]¹⁰⁴“阜落之国”^[1]¹⁰⁵“辄沐之国”^[1]¹⁶⁶“炎人之国”^[1]¹⁶⁷等简单胪列者,此处不妨列举部分文本内容如下:

四海之齐谓中央之国,跨河南北,越岱东西,万有余里。其阴阳之审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昼一夜。其民有智有愚。万物滋殖,才艺多方。有君臣相临,礼法相持,其所云为不可称计。一觉一寐,以为觉之所为者实,梦之所见者妄。^[1]¹⁰⁴⁻¹⁰⁵

首先,从文本内容来看,可见《列子》主体内容多有叙写各国略不同于中原之地的怪异风俗或社会状况者,与神仙方士之书《山海经》中记录海外诸国的笔法相似,而根据上文已有之论述,《列子》及《山海经》的部分片段在形成时间上交义明显,故其内容共通之处或皆为滨海方士文化干预渗透下的产物。其次,从学术思想来看,“化”是《列子》以超越的生存为终极目标的哲学起点及其论生命有无的核心概念^[23],而《列子·天瑞》在举例论证此生化之道时,所征引的却是从“若蛙为鹑”到“马生人”^[1]¹¹⁻¹⁸的所谓万物变化规律,其多出于主观想象而并无科学性,一如诸方士在尚未了解海外世界的情况下,以设想各国奇异风俗来弥补自身认知缺陷的做法,而此处“子列子”的特殊称呼及弟子百丰的出场,似乎亦暗示着此片段当出自列御寇门徒及后学之手,是方士群体崛起于燕齐之地后的创作。最后,从理论结构来看,《列子·天瑞》重点阐述前文提及的“贵虚”学说及列子学派的核心理论,论其性质当为《列子》全书的纲领与基石,而其具体叙述中明显多有阴阳精气之说,例如:

子列子曰:“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

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1]5-8}

又《列子·天瑞》两次称引黄帝之书,其辞曰:

《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1]3-4}

《黄帝书》曰“形动不生形而生影,声动不生声而生响,‘无’动不生无而生有。”^{[1]18}

诸如此类,均充分体现出《列子》对阴阳理论和黄老之学的重视,而从前文既有之论述来看,相关理论学说又恰好为滨海方士文化的重要思想渊源。在此基本前提之下,关于《列子》书中为何会出现较多为《山海经》等神仙方士之书所侧重的想象性内容的问题,即可于思想理论层面得到较为充分的解释。

在方士思想被赋予重要地位并应用于创作实践的情况下,《列子》对海洋的想象性书写充斥着令人神往的幻象和虚无缥缈的意境。然而,若据此认定方士文化就完全支配了《列子》的“海洋想象”,则又失之武断。以此回归《列子·汤问》的“殷汤问于夏革”之事,可以发现立于包括“海洋想象”在内的各种神异传说之后的结论是“吾何以识其巨细?何以识其修短?何以识其同异哉”^{[1]159},即在见识了种种不可预知的奇异之后,才发现世间万物原本都是浑然一体而无所分别的,所有事物最终皆可着一“虚”字^[24]。《吕氏春秋·不二》曾将列子思想总括为“贵虚”^{[25]404},而列御寇自己对“贵虚”的解释为“非其名也,莫如静,莫如虚。静也虚也,得其居矣;取也与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砢而后有舞仁义者,弗能复也”^{[1]28-29},与其在人为的、现实的索取之中迷失自我,还不如投身于虚无缥缈的静寂世界以保持自然天性。可以说,列御寇及其弟子后学在其论著中展开虚幻而遥远的“海洋想象”,实际上亦是对自身价值追求的探索实践,即以较之现实世界更广远的幻想世界来超越眼前所见的有限时空,并以此尝试寻求早已被前者所遮蔽的真实“人性”。在此种创作指向之下,列御寇及其弟子后学选择了汲取本门人士相对熟悉的燕齐滨海方士学说中的有益成分来拓展想象空间,并由此导致其相关创作沾染了浓厚的方士文化色彩,但是这种选择本质上仍未脱离列子学派的“贵虚”思想

基础,其选择是基于主观能动性而非迫于无奈的。

总体而言,《列子》的“海洋想象”作为战国中后期形成的叙述片段,因列御寇早年求学时与齐巫季咸的交流以及弟子后学“使于四方”的特殊经历,而与以齐国为代表的先秦各海洋文明发生着客观联系。与此同时,齐国等海洋型国家的总体航海发展状况以及由此积累的近海航海经验和有限的海洋认识,亦在历史层面上制约着《列子》书写海洋时的创作视野。然而,这种限制本身又引发了列御寇等人对于遥远海域的好奇和想象性探索,并与列子身为中原之人所带有的海洋认识局限一道,催生出《列子》具有超越性特征的“海洋想象”。以此现实历史条件为基础,列御寇及其继承者在思想理论和创作实践中主动吸收燕齐滨海方士学说,以浓厚的方士文化色彩渗透“海洋想象”,突出其以“虚无”守护人之自然天性的价值追求。《列子》的想象性书写虽然并非先秦海洋环境的真实记录,却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上古知识分子对于遥远海域和海外世界的思考与求索,而这种伟大的海洋探索精神与“向海”思维意识,或可成为当代中国海洋文化建设及相关历史考证工作的宝贵借鉴。

参考文献:

- [1]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马达.《列子》真伪考辨[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3]张洪兴.《列子》真伪考论[J].诸子学刊,2022(1).
- [4]山海经[M].周明初,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 [5]万群.从汉语史角度看《山海经》的成书年代[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2).
- [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7]王先谦,刘武.庄子集解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M].沈啸寰,标点.北京:中华书局,2009.
- [8]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刘佩德.列子学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 [10]陈成吒.先秦老学考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 [11]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2]安宇.淮海文化及其形成的地理环境[J].人文地理,2001(4).
- [13]曲金良,陈智勇.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先秦秦汉卷[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 [14]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15]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
- [16]别洛波利斯基·Л·О,舒恩托夫·В·П.海洋鸟类[M].刘喜悦,庄一纯,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 [17]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8.
- [18]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黄河志:黄河流域综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
- [19]刘向.战国策[M].贺伟,侯仰军,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
- [20]刘向.楚辞[M].林家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 [21]卫崇文.《山海经》与先秦神话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 [22]卢云.秦汉时代滨海地区的方士文化[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6).
- [23]卞鲁晓.《列子》的“化”:本体设定与具象过程[J].学术界,2016(4).
- [24]李友广.论老子对荀子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影响[J].管子学刊,2025(4).
- [25]吕不韦.吕氏春秋[M].高诱,注.毕沅,校.徐小蛮,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Marine Imagination” in *Liezi*

LIU Guoq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The narrative fragments pertaining to “marine imagination” in *Liezi* could be dated to the middle and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had a de facto connection with the pre-Qin coastal states with the State of Qi as the core. This connection stemmed from Lie Zi’s exchanges with Ji Xian, the divine shaman of the State of Qi, during his early studies, as well as the special experience of his disciples being sent to Sifang (all sides). At the same time, the offshore navigation experience and limited marine knowledge accumulated by the State of Qi and other pre-Qin marine civilizations in the course of navigation development also restricted the creative vision of the *Liezi* compilers when depicting the ocean. Such restrictions, in turn, triggered the creative collective’s imagin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open sea. Combined with Lie Zi’s and his disciples’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ocean, these factors gave birth to the trans-spatio-temporal “marine imagination” in *Liezi*. On this basis, the creative collective of *Liezi* took the initiative to accept the influence of the theories of alchemists from the coastal regions of Yan and Qi in both theory and creation. This further endowed the “marine imagination” in *Liezi* with a strong alchemist cultural hue, reflecting the value pursuit of embracing the illusory world to preserve one’s natural instincts.

Key words: *Lie Zi*; marine imagination; marine culture; pre-Qin philosophers

(责任编辑 雪箫; 实习编辑 穆林泽)